

● 传统与现代丛书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

责任编辑 谢 凡

装帧设计 苏家杰

从传统到现代

〔台湾〕金耀基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半精装 32开 8.25印张 2插页 20万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ISBN 7-5431-0150-5

C·10 定价：4.30元

(内部发行)

献 给

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人

——他们

忠于中国的过去，

更忠于中国的将来。

让现代化的步伐更为矫健(代序)

古希腊哲人有言：“万物皆流转。”历史的潮流亦然，总是在曲折、顿挫中奔腾向前。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汹涌澎湃的巨流中。沉滞的社会生活状态已被冲破，古老而辽阔的神州在向中世纪作最后的告别。我们已经跨出了最初的、关键性的步伐，但形势则是严峻的。必须反思和回顾，因为今天和明天乃是昨天和前天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西学东渐的大潮，大有裨益于走向未来：提高行程中的自觉性，减少和避免步履维艰和踟蹰不前。毋庸置疑，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跃动，决计不能全然抛却历史传统，也不允许一概拒斥外来文化，而定要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上作批判的继承和选择的吸收。兹事体大，不可掉以轻心。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真拜读了金耀基先生的大著《从传统到现代》。作者运用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多元方法论，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地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体系、价值系统、人格构造及其它，勾勒出社会文化及其心理的古今演变，阐明了作为中国的唯一出路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作者的渊博学识、客观态度和敏锐洞察力，使得本书的许多论断颇为中肯。他的“一波三折、反省审悟后的所见”和“心路的历程”，给予人们以不少启示。

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无疑是关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严重课题。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人类的前列。外来文化间有渗入，但未形成撞击之势。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迫使它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文化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国粹”不再能够维护“上国”的尊严，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视之为“以夷变夏”。于是，古今和中西文化的关系就成为一代代的社会精英深思和探索的课题。他们在熔铸自己的近代意识的过程中，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做出了回答。见仁见智，争论的热潮涌现多次。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又掀起了具有新的内涵的“文化热”。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其巨大的问号和惊叹号切入这场争辩，促使长期囿于学术界的局面大为改观。现代化大业呼唤着现代意识，“文化热”的根本动因就在于此。复古主义（以及“国粹主义”、“民族本位”等等）是行不通的，百余年来历史堪为铁证。鲁迅早已一语道破：若言“保存”国粹，先要国粹“保存”我们。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情性因素是不能统纳包收的。当然，不能从批判导向虚无——前者的目的在于继承；后者则会重蹈费尔巴哈的失误：在泼洒盆中的污水时，把洗澡的婴孩也丢掉。全盘西化则是另一种偏颇，因为西方文化决非尽善尽美，而外来文化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当然，笼统地拒斥外来文化是愚昧的，特别是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今天，更不能充当“荒岛孤人”——孙中山先生曾经讥评过的——的角色。本书在这对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的诸方面做出了科学的回答，确立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认识模式：“中国的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应无主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必须在批判中去肯定传统，必须在解除‘种族中心的困局’中去认识

世界。一方面我们应加深历史的意识，一方面我们应扩大心灵的疆界。”归根结蒂，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其共性和个性。它们都要走向“工业社会，但在这个进程中又都脱离不开自己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民族模式的规范。在复古与全盘西化的两极中超越过去，坚毅不挠地迈向现代化——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本书正确地指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因为“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对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更高层次的阶段，是无须抱着感伤和疑虑的——“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逆势而行。”决不能沉酣于历史的陈酿中，而应当承认生活迫使人们承认的东西，摒弃“主观性的偏执”，抛却“情绪性的蔽障”。当然，由于现代化的内涵不仅限于经济，还包括“文化社会的各个面向，诸如政治、教育、思想等”。因此，难免出现一些消极的、不协调的现象。本书承认台湾工业化的速度较快，也没有“出现英国初期那种惊人的工业化诞生的阵痛”。但是，也并非“一味顺遂畅快的”：“或多或少产生了社会解组，伦理失序，价值混乱，以及人口压力，都市挤迫，环境污染等现象。”这些问题给人们带来不安和惶惑，“也确值得认真的反省与批判”。然而，作者没有“为这一幅杂辨的图画的表象所混淆”，他反复强调“掌握其主干，抉发其发展的大趋向”，虽然，也从未“把现代化看作一片没有斑点的玫瑰红”。这种观念对于我们是颇有启发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一些消极混乱的现象。曲折和顿挫也是难免的，不能设想不付出代价。但是，命运攸关的是中国这艘航船终究冲出宁静的湖水，进入奔腾的激流，驶向光辉的未来。只有领悟了事物的本质和主潮，我们才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本书做了层次性的分析。作者认为

中国现代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面’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形变之链’的过程”——大致循着三个层次：第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第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第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在他看来，第一层次是较低级的。它“所受的阻力最小”，因为“它并不侵害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内部价值”。第二层次“又深了一层，也难了一层”，因为它是“西学之‘体’”，触及了“传统文化之内层”。第三层次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因为它牵扯到一个文化的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质素”。证之以中国近代史，这种见解确是包涵着真知灼见。洋务运动体现了第一层次。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意味着第二层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标志了第三层次的到来。三个层次的划分并非截然的，它们相互间存在着渗透交错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层次（当然，不是近代史中有关历程的重复）。应当以史为鉴，进一步认识现代化是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社会经济的变革，必须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同步变革为前提。决不能驻足于低层次，更不能忽视高层次。在开放和引进的问题上，同样不能局囿于西方的科技和管理。对与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商品化的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和有益的文化，也应有抉择地引进，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吸收，为我所用。这样，才能使现代化的步伐矫健，逐步摆脱摸索状态，入于自觉的更高阶段。

总而言之，《从传统到现代》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当然，由于海峡两岸的社会制度和理论信仰的不同，必然会在一些问题上同我们的认识有着歧异，为个人所不敢苟同。但在存异的同时，又深感相通和相同——一个宏伟的目标把亿万中华儿女的心灵贯串起来，那就是祖国的现代化！

是为序。

张 磊
1989年春·广州

新 序

十二年前，我出版了《从传统到现代》这本小书。这是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以社会科学上的知识为基底，对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前途，所提出的一些分析，一些看法。这本书里面所收入的文字则有十五年前写的，而书里面的一些思想的酝酿则还要早些。事实上，当我在台湾大学做学生时就被这个问题“迷”住了。当然，任何思考的人，总会因他的知识与经验之增多或转变而或多或少地修正他的看法。我对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探索，也可说是经过一波三折之后才慢慢形成一些比较系统性之理解的。我对自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论战，总觉得一直在死巷子里纠缠，不会有什么出路。我认为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变迁”的问题。只有从社会变迁之动理中去了解，才能掌握到问题的核心。而要走出思想上的死巷子，则只有从复古与西化的两极间超越过去，理智地向“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我当时在原序中有下面这一段话，颇能道出我的心境，容许我抄录下来：



从客观的现象去理解，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保守主义也好，全盘西化也好，中西合璧也好，都是古典中国在西方

文明挑战下所产生的本土运动的几个面向。从道德的动机上看，可能都是不错的。但是从文化认知的观点来看，就不免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作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努力都是“功不唐捐”的。至于像梁漱溟先生那种“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忱，胡适之先生那种报忧不报喜，宁做乌鸦，宁做“国民公敌”的大智大勇，在今天看来，都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伟大的典型，我们实该感谢他们的启示与贡献，追踪他们的脚步，而超过他们的前头去。时至今日，假如我们能 把眼睛放远一点，从世界的结构中来 看中国问题，那么，中西文化的论争实在是可以收金息鼓了。一百年了，我们不能 再为“童年的兴奋”所左右，我们应该成熟些了。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明白地看出，中国的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应无主地倾向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中打滚。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唯一可走并正在走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批判中去肯定传统，必须在解除“种族中心的困局”中去认识世界。一方面我们应加深历史的意识，一方面我们应扩大心灵的疆界。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在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之后，中国的历史之流将不会 终断，并将继续长流；中国文化的光辉将不会熄灭，并将烛照天 宇。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在“势”上，并且亦在“理”上必有与当有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大纛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彻底地放弃他的一偏之见（假如有的话），收拾意气，化干戈为玉帛，共同献身于一个现代的中国的建造。现代化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能逆流而泳；现代化也是世界的趋势，我们不能违势而行，这是我个人在思想上一波三折，反省审悟后的所见、所信。这也是我个人年来有系统地 从学理上发挥此一观念的初衷之所在。中国现代化

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高更成熟的境地。

二

《从传统到现代》出版后，引起了不少反响。假如销路也算是一个指标的话，那么这本小书可说是颇为成功的。因为它连续出了三版，都相当快售罄了。这对我自然是一很大的鼓舞，但令我最高兴的还是这些年来看到知识界文化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不断加多，不止观念上日渐普遍清澈，而且政治社会各领导层更通过各种计划与行动，将现代化观念付诸实际。至于我自己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外，还陆续写了不少文字，后来大都收集在《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一书中出版。《从传统到现代》与《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两书可以说是我为寻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心智上所作出的一些努力，也是我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精神上所尽的一点奉献。不必讳言，这两本书都是我心智历程中所留下的一些鸿爪，里面有些论点必定不够周到，不够深刻，并大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的。也因此，《从传统到现代》三版售罄后，一直没有重版。年来，有不少识与不识的读者，在口头上或书信上催我重版。我也确实认真考虑过，并且计划作一修订。但继而发现，修订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开始修订，则必须大动手术，这样就不啻写一新书，此则实非时间精力所允许。于是，重版的计划就搁置下来了。一搁就搁了七、八年，并且很少再去想它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劲草文化事业公司计划出版《中国现代化的动向》的论文集，邀我写一序文，我即一口答应下来，写了一篇三万字的《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的长文以代该书之序。这是我自一九六七年离台七年后重返台湾，见到台湾现

现代化之现象后的检讨性的文字。我觉得台湾现代化速度之快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想，也远远地把许多现代化的理论与看法抛在经验事实的后面。我的长文中，直接间接地在补充或修正我《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不及的地方，也可说此长文最能代表我目前对中国台湾现代化的看法。

三

今年七月间，我为王岫卢师九十大寿又有返国一行。在台北二个星期中，见到不少新识的年轻朋友，他们都很关心地问我是否考虑重版《从传统到现代》，有几位且表示是否可授权他们代我出版。我好奇地问他们对此书的看法。一个看过此书而颇有代表性的答复是：“这仍是国内一本讨论现代化很有用的书，我赞成其中不少的见解，但也不同意其中某些看法。”我对这样善意而具有批判眼光的读者是最感到安慰与欢迎的。这样的反应又一次使我产生要不要重版的想头。但最后导致我决定重版此书的还是基于一个更严肃的动机。

在我最近这次台北之行中，我又听到也看到不少广义的或边缘性的文化性的论争，其中出现不少讨论，批判，但亦有中伤诬蔑“现代化”的论调。这些言论，有些是耳熟能详的老调；有些则是有见解的新论点；有的纯是情绪式的发泄，有的则很有讲理的风度。对廉价的文化论争，我向来就无兴趣的。对感情用事，甚至泼妇式的骂街或师爷式的周文深纳，我觉得是对语言或文字的最大侮辱，我更不愿置喙一词。但对于现代化运动认真提出疑问，特别是对台湾现代化的事象与趋向严肃地提出批评，我觉得不但是知识分子合理的，甚至是应有的态度。知识分子对于关乎整个社会、人生大问题的现代化自有责任，也有权利（不多也不少于其他人士）加以辨析与讨论；自有责任，也有权利提出他的

看法。由于我个人相信中国现代化是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在“势”上，也是“理”上当有的发展。因此，我愿意再度把我十二年前的见解呈现在国人之前。这是我决定重版《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动机。我前面已说过，这小书里的见解是粗疏的，也不能完全代表我现在的心态与知识水平，但此书仍是我所喜欢的，里面的主要见解仍是我继续所相信的。是以，我决定对原书不作更动，只改正一些错字和增删少数文句，并把一些可以节省的英文字删去（十二年前，书中的一些词片，原先是较生疏的、隐晦的“术语”，故加上英文，而现在这些术语则大都已经成为知识界普遍了解、应用的词片了）。同时，我特加上一篇文字。这是上面提及的一九七四年所写的《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此文可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补充。由于此文原为一书之序，故我作了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使其成为一独立之文。

四

趁《从传统到现代》重版的机会，我觉得我应该对台湾的现代化事象作一些分析。特别是，我想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提出进一步的看法，以补原书之不及或不足处。因为我知道有人对台湾的现代化，特别是对其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有极深的不满与憎恨。这些不满与憎恨可能是源于道德上的感受，可能是源于文化价值上的反应，也可能基于其他的原因，但不论其动机为何，这总牵涉到认知的问题，也即涉及到对台湾现代化本质与性格的理解的问题。人不可能完全免于主观的判断，而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涉及到价值选择的问题，但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总希望能尽量摒弃主观性的偏执与情绪性的蔽障。

在我看来，台湾二十余年来，其基本的文化动向，一言以蔽

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是中国的现代化。就现代化各个面向来说，其中经济现代化的表现无疑最突出，也最出色的。台湾的经济现代化已为学者共认是二次大战以来众多社会在现代化运动中少数成功的例子之一。台湾的经济现代化，在极短的时间中把台湾的经济体系从一“低开发”的社会转向“开发中”的社会，并迅速地通过“准开发”社会的阶段，推向“开发”的工业社会。

最重要的，不仅是其速度之快，而且是它所展现的性格。台湾的工业化过程中，显然没有出现英国初期那种惊人的工业化诞生的阵痛。当然，在现代化发展中，台湾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转变，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同时，在台湾新工业结构形成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味顺遂畅快的。这个从农业转向工业的结构形变的过程，在欧洲常需一、二个世纪的时间来调适，但在台湾却浓缩在几乎只有一个年代之中，因此或多或少产生了社会解组，伦理失序，价值混乱，以及人口压力，都市挤迫，环境污染等现象。这些现象都会带给人们惶惑、不安、失落，也确值得认真的反省与批判。但我们必须不为这一幅复杂的图画の表象所混淆，我们更不能像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工业化诞生的阵痛看作是资本主义死亡的挣扎，这不止是雾里看花，而且是带着一副先验的意识眼镜看事象的。我们应该把握其发展的主线与根干，特别是要了解其发展与转变的趋向：了解那些是本质，那些只是表象与副作用。简言之，我们在面临这些现代化的问题乃至病态的时候，一定同时要平心静气思考一下，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是否也有或更多正面的健康的果实？

从某一个层次或角度讲，人们之不满或憎恨现代化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向往“晨光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或者憧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的人，很少能容忍工商业社会那种“心为形役”的生活，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痛楚与病象必然更会触引人们的反感。但是，比起英国工业化早期的“大阵痛”来，台湾的工业

化几乎是一“无痛的生产”，比起当年柯波迪（Cobbett）及年轻马克思对英国工业化之批评来，台湾一些人士对工业化的批评可说是点水蜻蜓，浅而不深。自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看，“反工业主义”可说是任何社会在工业化早期过程中必有的现象，它几乎是一切保守派与激进派所共有的反应。这种对工业化病象（误以为是资本主义之特产）采无保留的批判态度者，可以马克思为象征性的代表。Adam B. Ulam 把这现象（即工业化早期中出现的“反工业主义”）称之为“马克思情境”（Marxist Situation）。“反工业主义者”的共同特征是专看工业化的病痛与黑暗面，而固执地拒绝去承认社会与经济的进步面与光明面。的确，“往日有多美好”的极端化像“未来有多美好”的极端化一样常是对“现在”根本否定的情绪的根源。我们以为猛赞现代化与猛抨现代化都只见到“半个现代化”。现代化常是一痛苦的社会形变的过程，它不但在初期有阵痛，恐怕在不受节制的情形下，还会走上更可忧可悲的境地。我个人对现代化就不是一个无保留的乐观主义者。我虽然极力赞成现代化，但在十二年前《从传统到现代》出版的当时，我就写过《现代人的梦魇》一文。我从来不敢把现代化看作一片没有斑点的玫瑰红。不过，看到台湾今天的现代化情形，我毋宁是比较乐观的了。台湾已经和平地通过了，甚至蹿过了“马克思情境”。整个地讲，台湾出现的国民总产量值的稳健而快速之成长（今天台湾一地即是世界第二十二位最高的贸易单位），国民生活水准是年以继年的提高与改善（在台湾每人每天消耗2800卡热量，是亚洲之冠），社会文化的格调也日渐在量变中转向质变（此大致可从出版界看出来）。一点不夸大，台湾的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现代化，是台湾生命力的根核。它虽然出现不少病象，但基本上是健实而富于活力的。经济现代化不但带来了活跃的工业化，而农业上生产力亦不断提高。城市与乡村之发展并未产生巨大的相克相伤之局，且其距离日趋接近。其中最可称道

的是：台湾不但在社会总财富上大增，而且有日渐走上“均富”的现象。诚然，台湾有大资本家，财富之积累甚为剧巨，但此毕竟属于少数之少数，而这些人就业机会之创造上，工业技术之推展上，都不能说对社会无重要功能。从社会财富之全面结构看，贫富之差距是不断在缩短。1952年，台湾平均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十五倍于平均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到了1975年，其差距已缩小到四·三七倍（此根据1977年8月22日Time周刊之报导）。中国的经济，一向的问题是患于“寡”，而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最堪忧虑的问题则是“患不均”，照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则常不免出现“不均”之现象。许多经济学者且以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是无法并存的，关于这一点，我个人倾向于米道尔（G. Myrdal）的看法，即社会公正的改革并非必妨害经济的成长（见附篇：中国现代化的动向：一些观察与反省）。最近看到费景汉先生的《均富观念的检讨》大文（刊于联合报：1977年8月14日）更增加了我的信念，费先生说：

“以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来说，我们不但没有发现所得更不平均的现象，而且自一九五九年以后，所得分配逐渐平均。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即令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鱼与熊掌也可以兼得。这正是台湾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突出，最引起世界注意的原因。”

我们以为这应该是衡估、判断台湾经济现代化之认知的基线。我们对台湾的经济现代化不能只看其黑暗面，不能只挖掘其病象，而应该也看其光明面，也彰显其健实之象，更主要的还是掌握其主干，抉发其发展的大趋向。从全球的社会发展看，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台湾的现代化的大方向是走对了路，它从摸索

地走，到自觉地走。

五

中国现代化当然不止限于“经济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文化社会的各个面向，诸如政治、教育、思想等；它所冀求的价值，除物质的富足外，尚有民主、自由、公正，和滋润心灵、丰富生命的艺术等。这些价值与经济性的价值有关，但却无必然的关系。这些价值在社会发展的各种阶段中，与经济现代化的逻辑（如效率化、市场化等）或和谐结合，或相拒相斥。当发生不和谐与冲突时，自不能免于“选择”的问题。选择就需把我们所冀欲的价值加以通盘与慎重的衡量，以作出取舍。亦即在出现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就要在二者之间作一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情非得已或十分痛苦的。而这种选择当然要以社会本身之情况为衡准。譬如美国在经济成长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作选择时，或应该放弃经济成长，以保护生态环境。但在开发中社会则不应或不能如此选择。在今日的台湾，为了促进刺激经济发展，有时在政策与制度上常不能不在“某程度上”容忍平等与公正等价值之相对地牺牲。当然，这也只能限于某一程度，如果完全牺牲了平等与公正（如斯大林为了增加生产力，而竟指责平等观念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加以彻底否认）则绝不是一个真正现代社会所应“容忍”的。反之，如果过份形而上地、不顾实际地鼓吹绝对的平等与公正（如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思想之主流）则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欲如此而达到现代化社会则不啻是镜花水月。

台湾在经济现代化早期，如费景汉先生所指出，就能把生产力与分配公正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现象，当然最值得欣慰。不过，在很多情形下，我们常不能鱼与熊掌兼得。譬如在古典文学所透露的那种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常是人们所向往的价值境

界，但是我们要工业化，我们就不能不，至少很难不牺牲了。何以故？因为那种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毕竟在传统社会也是少数人的福气，多数人的胼手胝足，也不过得一温饱，而农人所有的“悠闲自得”也恐怕很少能赋予太多的浪漫情调。说到这里，我想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我想我会喜欢十八世纪，假如我也是属于那些有权利享受它的人”。“有权利享受”的人，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舒服的，也许在传统社会尤其舒服。但我们不能只顾到“有权利享受”的人，而现代化的最大理由，就在于它可以使最大多数（假如不是全部）的人都可以享受一个时代的产物。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作的选择，有些是较易的，也不必厚今薄古，不必对传统历史的事物或价值作不必要的牺牲。譬如，我们建造一条公路，适巧有一幢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屋横梗其间。这时，我们是否就可不分青红皂白，以现代化之名而铲除那幢古屋呢？我想不是。我们应该在保护历史古物与利便交通这二种价值中作一选择。假如保存古屋，除了不利便交通外，并不影响更高的价值（如对民生有害），那么我们应该保护那个历史性的古物。保护历史性的古物是不是一定会有害于现代化呢？我想决不是。我们曾一再强调，现代与传统非一对立体。现代与传统间有无数种结合、搭配的可能性。如实地说，在现代化过程中，许多传统事物与价值都有安顿的可能，我甚至要说，越是现代的社会，越有保护传统事物的可能性。总之，现代化是一不断地“选择的过程”。这牵涉到每个个体与团体层次的选择。选择永远是一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也永远是一创造的活动。只有在思想上最懒惰，或者在观念上只有传统与现代的两极观的个体或团体，才会狂热崇新，或狂热地迷古。